

• 37

古為今用
洋為中用
由古入新
博採眾長
就地取材

五四六

中 國 建 築 學 術 研 討 會



中青年学者中国
建筑传统与理论
研讨会论文专刊

- 1 筚路蓝缕 乱中寻序——关于中国古代城市的研
究方法

王建国

- 10 探骊折札——中国建筑传统及理论研究杂感

王其亨

- 20 从中国建筑史研究引文分析的初步结果看其学科
的发展趋势

余 健 陈小宁

- 25 方法论与中国建筑传统与理论研究

朱光亚

- 30 从文化的交流机制看中国建筑的演变

常 青

- 34 建筑如何面对自然——东方的追求与西方的抉择

王贵祥

- 44 生死智慧和一条永恒的金带——中国古代陵墓生
成机制初探

陈 薇

- 52 中国建筑与地区风格在台湾的发展过程与实例研
究——兼论台湾建筑的新方向

吴光庭

- 63 台湾地区建筑演变与社会变迁关系之探讨(1945 ~

1987)

阎亚宁

主 编：王伯扬
编 委（按姓氏笔划为序）
邓林翰 白佐民 刘宝仲 刘管平
庄裕光 任焕章 阳世镠 杨君武
晏隆余 黄汉民 彭一刚 喻维国
蒋智元 谭志民
责任编辑：黄居正

● 建 筑 论 坛	74 文化决定论——论人的主体性并兼与经济决定论 商榷	萧 默
● 建 筑 设 计 研 究	79 现代高层建筑标准层设计（下） 湖南大学 杨建觉	
	92 高层建筑的垂直运输与电梯（中） 陈 新	
● 新 中国 著 名 建 筑 师	101 张锦秋	
	106 曾坚	
● 连 载	110 建筑的理性主义与浪漫主义（六） (美)莱斯尼科夫斯基 著 韩宝山 译	
	127 现代建筑之后（四） (意)波罗·帕托给西 著 常 青 译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出版、发行（北京西郊百万庄）
各地新华书店 经销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印刷厂印刷（北京阜外南礼士路）

*
开本：787×1092 毫米 1/16 印张：9 字数：223 千字
1990年7月第一版 1990年7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6,650 册 定价：4.85 元

ISBN7-112-00903-0/TU·643
(5971)

●中青年学者中国建筑传统与理论研讨会论文专刊

编者按：在中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支持下，1988年11月27日至30日由东南大学建筑系主持召开了“中青年学者中国建筑传统与理论研讨会”。全国高等院校和科研、文物保护以及有关单位的代表30余人出席了会议，共提交论文21篇。台湾文化大学学者吴光庭先生应邀特赶来参加了会议。本期选登了此次会议的十篇优秀论文，以飨读者。

筚路蓝缕中寻序

——关于中国古代城市的研究方法

王建国

中国古代城市向为建筑史学研究的一个重点，也是一个难点。说其重点，是因为城市为其它建筑门类提供了实存的空间背景和文脉联系；说其是难点，是因为城市整体的驾驭和洞悉比其它一般建筑更需要有一套比较完备而行之有效的分析工具和方法。

一、古代城市研究与 古代建筑研究的差异

相比城市客体而言，古代的宫殿、庙宇、陵墓抑或园林在今天大都可明确归属于“文物建筑”的范畴，其概念和价值较易限定，也比较准确，因而常具有静态特征。一般来说，除个别例外，这些“文物建筑”在古代都有一个相对较短的建造时限和相对限定了的时空条件，随着社会的发展，时过境迁，更年易代，这些建筑有些坍塌颓败甚至荡然无存，而有些则经历了一个原先功能衰微消逝的过程而相对凝冻起来，成为下一个时代“纯粹的”历史遗存。

城市则不然，绝大多数城市乃是经历一

个相当长的时间跨度累积渐进的产物。现代城市研究的成果证明，城市作为一种历史现象，各个时代的人为影响和物质印痕都在这一历史现象中积聚、交织并且互相更替。城市永远面临着新生与消亡，保留与淘汰的双重抉择，新生与衰微的社会之间和不同的建设概念之间的冲突和互补，构成了城市发展的原动力。那种在短时间内集中人力、财力和物力建设起来的城市是为数极少的，它们不能说明古代城市的主导运动轨迹和历史发展过程。因此，城市客体的本质特征是动态性，它具有如同生物有机体那样的新陈代谢现象和物质形态的“合生”(accretion)“拼贴”(collage)性质(图1)。

通常情况下，即使外部时空条件改变了，城市也总是以一个平缓的过程逐步去适应，一般不会发生沧海桑田式的突变，只会渐变，或者趋于衰退、消亡，或者逐渐走向壮大、强盛。事实说明，城市结构具有相当的稳定性和凝聚力，哪怕城市界内的建筑物和空间已经全然改变。正如桢文彦所指出：“城市的

结构与单体建筑不同，它的构图形态更富于传统性和习惯性，……在很多情况下，无论其表层变化多么强烈，但其深层结构却顽固地抵抗着”（朦胧的城市，世界建筑1988年4期），同时，城市界内的部分与部分，及其物质构成因素之间也都存在建造条件和时空背景的差异，这无疑构成了城市较一般古建筑具有更为斑斓多彩、纷繁莫测的表层征象，

可以说，完全均质的城市是不存在的（图2）。

这就造成了一种现象，我们可以在今天对一幢或一组全然以历史面貌出现的建筑进行分析研究，但却只能在今天实存的城市现状中来研究它的历史形态，即是说，建筑可以做到是“原装的”，而城市只可能是“组装”甚或“重装的”时间叠合产物。因此，必须要有一套相应的分析手段和研究方法。



- 我们可以把文物建筑或历史景观作为明确的客体对象加以全面保护。
- 但无法对一座城市施行全面保护，城市的本质是动态演变和新陈代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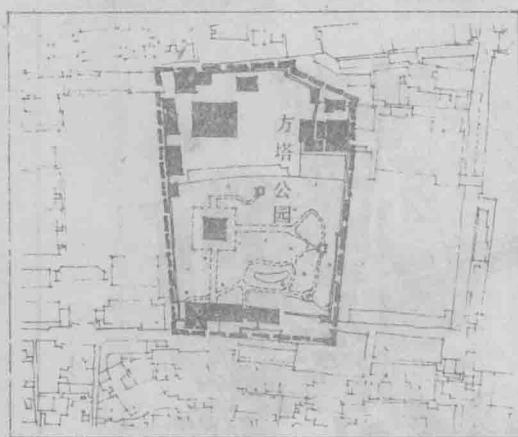
图1之一 历史文化名城常熟市古城区平面图



A：琴水河中段水巷景观



B：琴水河南段景观



C：崇教兴福寺（方塔公园）平面

图 1之二

其次，城市的范围和规模比一般“文物建筑”对象大得多，建筑功能通常较为单一，概念也较易限定，而城市则是一个多功能、复合的动态演化的实体，研究者可以运用比较常规的方法，比如建筑学的各种方法，在较短的时间中去认知、理解建筑客体外显的物质、风格、材料和技术等特征，而对城市就不行，我们只能在城市的某一局部来体验、理解城市，同时须结合社会学、地理学、经济学和历史学的研究，其认识需要经过一种格式塔式的叠加处理程序，作为人与社会互

动的生存场所，有时人们一生也未必能完全理解自己所在的城市，难怪不少国外学者认为“城市是一个谜”(A city is a myth)。特别是追溯研究远古城市时，“我们发现的将不是作为市场的场所或堡垒，而是一种超自然的世界创造理想”(Paul. Wheat, 1971)。它是一种“心理的，而非物质的武器”。(Kevin Lynch, 1981) 虽然无论是文物建筑、抑或是城市都可从肉眼实际感知，但城市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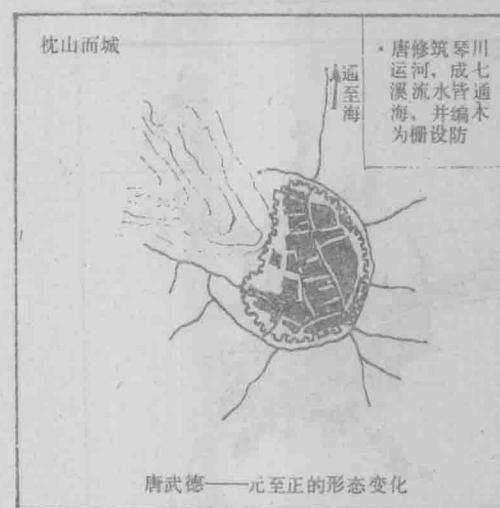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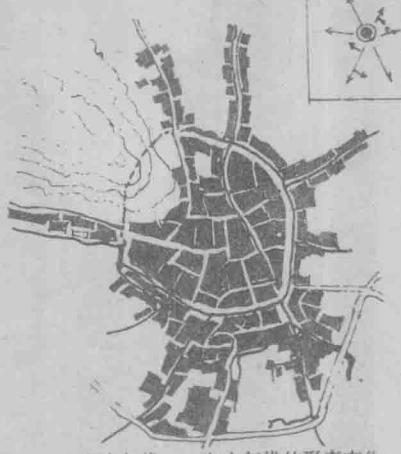


图 2之a 江苏常熟市的形态演变过程
(城市结构基本不变)

· 元代张士诚
“环岭为垣”
“腾山而城”
· 明代王铁证
筑倍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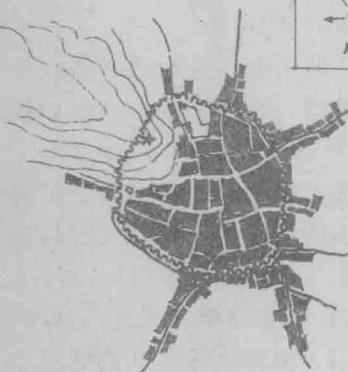
元至正——明万历的形态变化

b



六十年代—七十年代的形态变化

e



明末——清末的用地形态变化

c



清末——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形态变化

d

· 形态的转换 (拓扑形→几何形)



八十年代以来的形态变化

f

图 2 之 b ~f 江苏常熟市的形态演变过程
(城市结构基本不变)

包含的信息量之大、之多、之复杂常会使研究者精神超载、难以驾驭。

因而，研究城市比研究建筑更需要借助于某种方法来作为入门的钥匙并有效地缩短认识周期，唯此，才能既楔入城市中作由内向外的观照，又能跳到比单个城市更为广阔的区域背景层次上达到高屋建瓴式的领悟。

二、我国当前古代城市研究之窘困

迄今为止，我国古代城市研究方法尚十分匮乏，以致使进一步研究深入举步维艰。如上述，研究古代城市比一般建筑要困难，而笔者认为，研究中国古代城市就更为困难，其显见原因有两方面。

一方面，我国古代有关城市建设的历史记载，文字资料和图录均十分粗糙，支离破碎，准确性很差，而且带有强烈的社会伦理色彩，主观意识浓厚。因工作需要，笔者近几年曾收集了部分方志中的城镇平面图和山川形势图，用今天眼光看，这些插图之原始、

之不准确十分惊人，连示意图都不够格，作为城镇形态史实记载的地图，其特征应是客观的、数学的、非个人的和精确的，至少应具备三个条件，一，外形轮廓确切；二，相对位置确切；三，比例尺度确切。而事实上，我国古代除极少数地图曾用过矩形网格制图法外，大多数地方志中的城镇地图都不具备此三条件，有时甚至是纯山水画形式出现的视觉陈述，画法几何和透视法不发达是其主要原因。用这种地图加上常常是含糊其辞的文字来说明古人的城市意象尚可，但据此作精确定量研究就很困难。甚至不亚于研究记载详尽的国外城市的难度，欧洲在文艺复兴后，便广泛运用了托勒密的定量制图法，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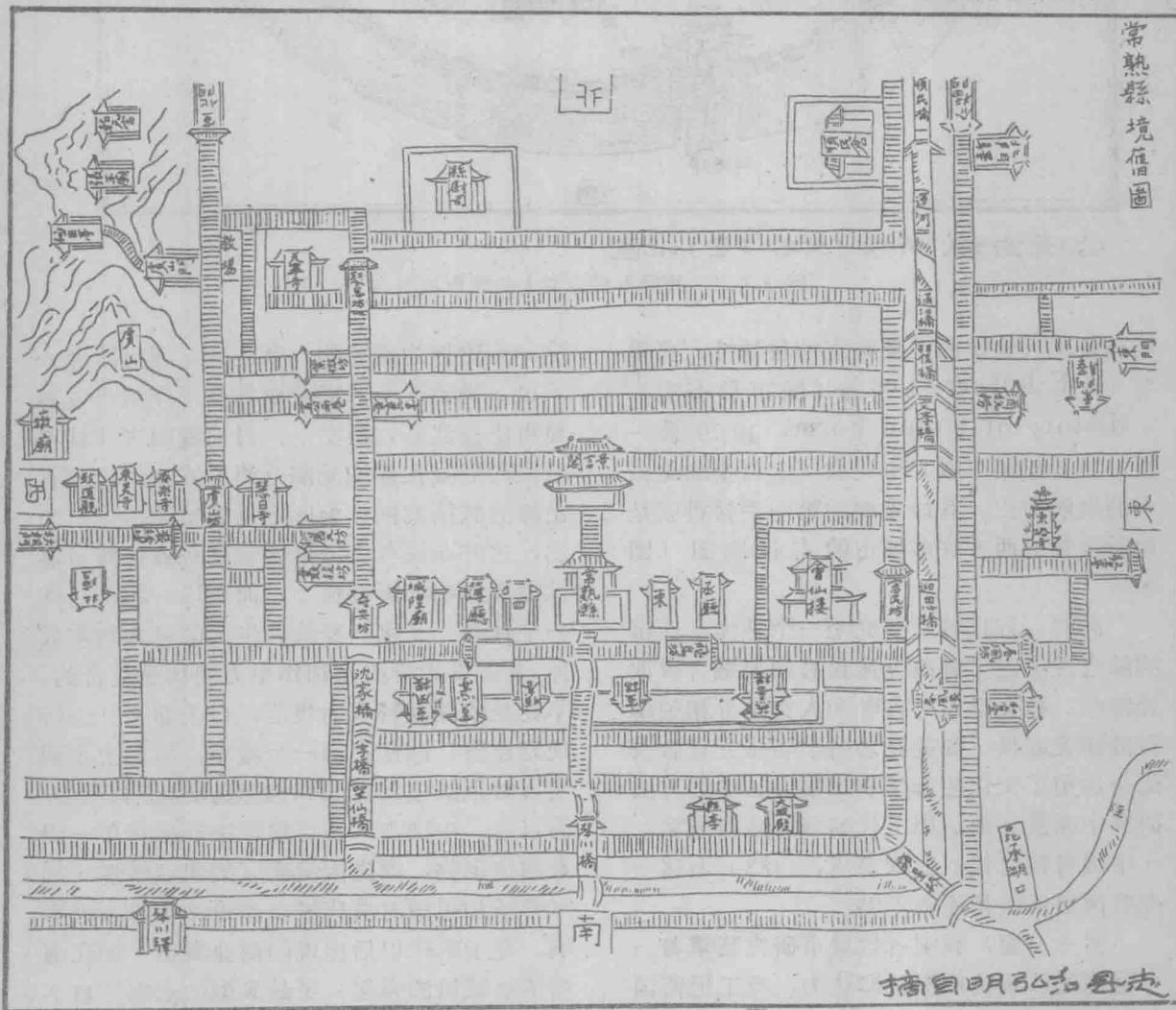


图 3之一 我国古代志书上的城市地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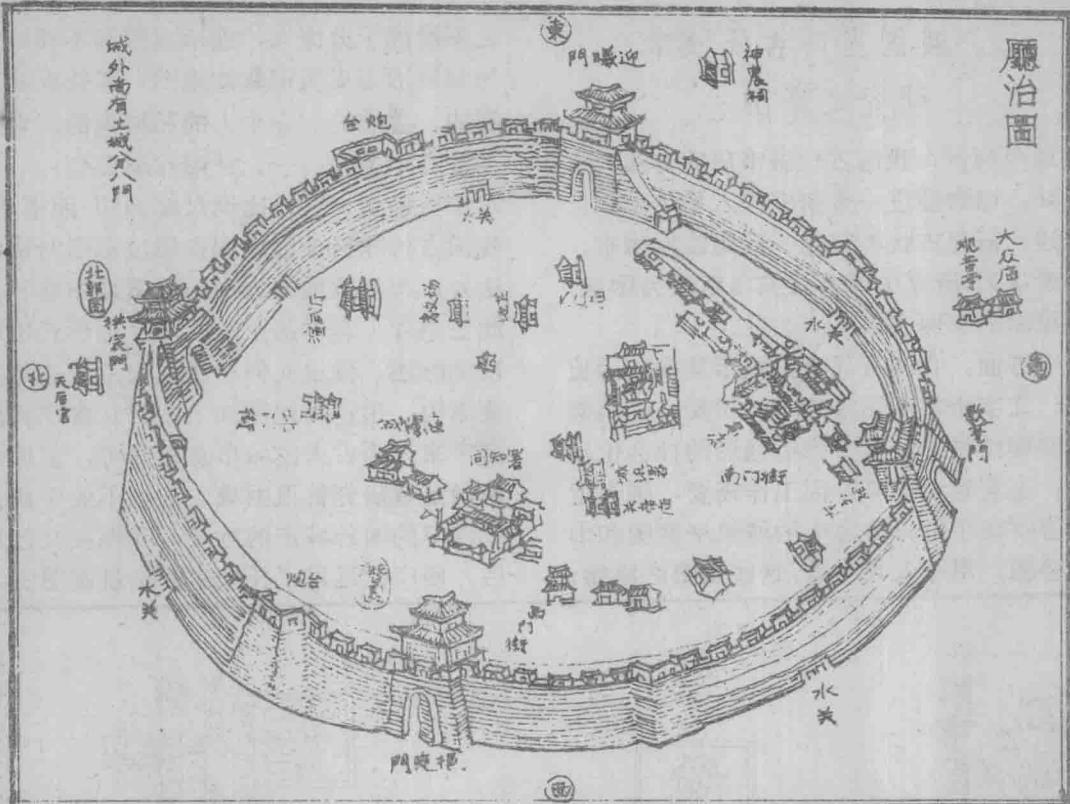


图 3之二 我国古代志书上的城市地图

经具备现代地图的主要特点和科学性；莫里斯（A·E·J·Morris）所著《城市形态史》（History of Urban Form, 1979 第一版、1982 年第二版）中记载了上百个欧美城市的发展历史，其最重要的第一手材料就是他所收集的西方许多城市的古代地图（图 3）。

同时，古代城市研究是一个整体，城市的综合性决定了其研究途径必须要融合汲取经济学、社会学、考古学和人类学等相关学科的研究成果。如美籍著名学者张光直教授综合运用了文化生态学和聚落考古学的方法研究中国夏、商、周三代的城邑获得成功。（中国青铜时代，三联书店，1983）而这一点我国目前做得还很不够。

另一方面，我国古代城市研究笼罩着一个强烈的认识论前提，即认为，考工记营国制度一统中国古代数千年的城市规划建设，

这一定论作为研究的一家之说，无可厚非。不过，笔者认为，以此概括几千年城市发展显得比较武断。事实上，目前我国古代城市研究尚局限在都城及部分州府城，还远没有足够的城镇案例作为此定论的实证依据。当然，这并非说考古记营国制度对古代城市建设没有影响和影响很小，而是说，城市这样一个社会、文化、经济和生活的复合物质载体，其建设影响因素和作用力同样是复合的，不光是依据某种人为规范，“自上而下”进行规划建设。即使在同一个城市，历史上不同发展时期的建设意匠和构思也是差别巨大的，简言之，中国古代城市建设决非某种单一因素的决定物，崇尚因地制宜的建城学说（如《管子》）也曾对古代城市建设产生过重大影响。至于宋代以后出现的商业城镇（如江南明清小城镇的崛起）更是典型的依据“自下而上”生长发展途径的产物，它们与自然条

件和区域经济背景有着比政治文化更为密切的关系，笔者曾就江苏常熟市的案例分析论述了“渐进主义”(incrementalism)模式在古代城市建设中的作用。(常熟古城的规划与建设，城市规划，1988年第5期)

从研究视野和方法看，一位研究者自己不花气力，而轻易搬套别人的结论作为自己认识的预设框架是危险的。这种简单化的研究探寻方法极易导致草率的结论，而掩盖真正有个性价值的创见，致使本质上是突破创新的史学研究僵化。反观发达国家的城市建设史研究，学派林立，众说并存，如Nolli地图分析法，Lynch的规范模式论，Rapoport的文化生态分析法、Van Eyck的场所分析理论等。当然，上述每一种视野和研究方法都有自身不可避免的“盲点”，但之所以存在且有人拥护，必然有其内在合理的一面。而诸家学说的竞争并存局面，正是城市研究繁荣深化的必要条件，我国目前古代城市研究已有明显的单一化趋势，因此，许多基础工作必须从头做起，而首先就是要摆脱预成论的桎梏，迈向方法和视野的多元化。

我国目前正值城市化高潮阶段，城市物质建设正在经历一场亘古未有的巨大变化，但是我们应该看到，在没有真正认识、理解历史上城市的价值和作用的情况下，城市建设的速度愈快，则对城市威胁愈大，就愈容易将历史上城市设计和建设的精华部分连同坏死和不适应部分一起抛弃。从可行性分析，我国古代城市物质形态的真正脱胎换骨和大规模扩张是在近现代经济关系和生产方式改变之后，目前进行研究尚可能在现存城市形态结构中探寻到一些历史线索，(当然不同城市之间有差别)比如通过建筑遗存、老人回忆，地名、方言以及历史上建设留下的各种物质印痕和文化生活形态等。而一旦这些线索完全中断、不复存在，那么如前述，仅凭文献记载和历史地图来研究它就相当困难了，这正是研究中国古代城市最主要的窘困所在。

因此，当前加强对中国古代城市的研究

已经刻不容缓、迫在眉睫。

三、古代城市研究的特点及其类型学分析方法

在不是绝对严格的意义上，我们可以认为，城市就是一个有机体。著名城市史家芒福德(Lewis Mumford)曾指出“城市结构的一些发展过程、恰与各种有机体的发展进化不同阶段极相类似”。本世纪的霍华德(E. Howard)、盖迪斯(P. Geddes,)、赖特(H. Wright)等都是城市有机论的推崇者，这种思想在今天已经成为一种“公认的”形态价值理想。(Lynch, 1981)这里，我们不妨通过类比来具体阐述城市这个有机体的研究特点。

如果把一座城市比作一棵大树，其中的重要公共建筑就可比作是大树的枝桠，一般大量性建筑则是其树叶。树主干横截面上的年轮记载着这棵大树的生长年龄和盛衰，城市各个时期建成区的变化和增长方向之形态地图的叠合则构成了这座城市的“年轮”，它同样镌刻着其历史形态的衰荣和时空条件的影响。在生长过程中，树叶很容易脱落，尔后又长出新叶，枝桠就相对稳定一些，但如毁坏或攀折(如会昌灭法，捣毁佛寺，开国君主烧毁前代宫殿)，主干上仍有重新生长出来的可能，然而，一旦主干遭砍伐，再生就很困难，即是说，如果城市的整体结构破坏了，就可能是一个不可逆的过程。

从研究角度看，观察树叶和枝桠的生长形态和质量比较直观容易。主干要看出短时间的变化就不容易，而要真正认识这棵大树的生长机制和特质，则必须设法透过外观的征象而楔入到主干内部，对生长年轮及其不同时期、不同外界条件在年轮中留下的作用印痕进行研究。唯此，我们才有可能去把握它的过去，尔后，以此为基础再行推论那些人们早已淡忘的、或者是当代人根本无法形象地感知的种种历史形态。笔者认为，这一类比可以比较直观，同时也比较确切地说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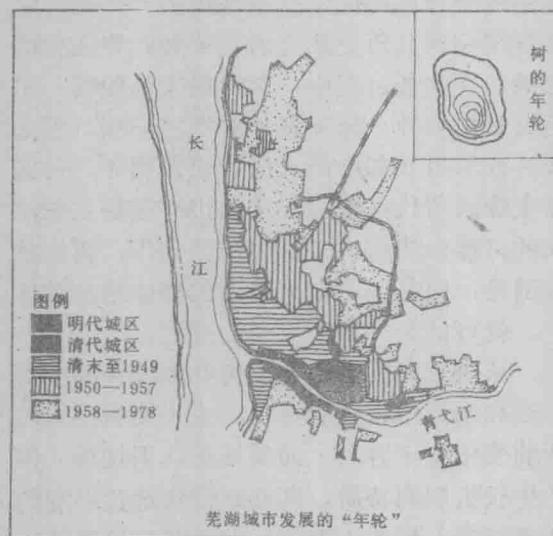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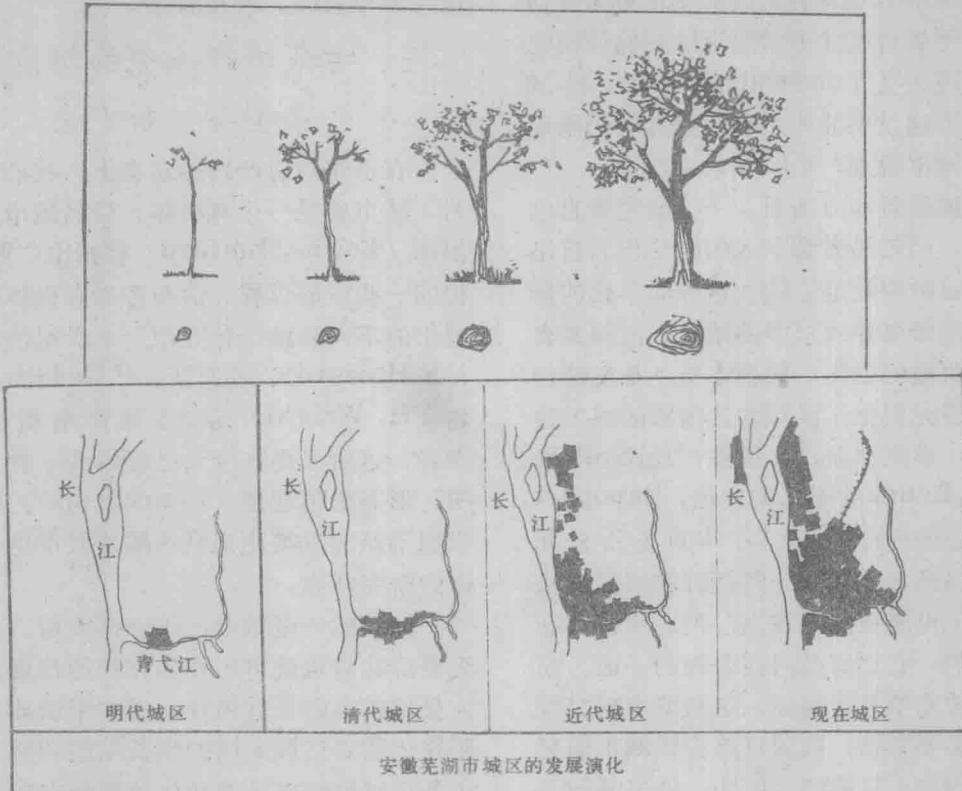


图 4 城市机体的生长演化特点

研究古代城市的方法论特点。(图 4)

根据国外研究成果，与城市建设有关的变量多达97个，举其要者亦有20个。(Gibson, *Designing New Cities*, 1977) 因而具体研究一座城市仍有删繁就简，选择主导变

量的问题，这也是许多学者向感难治之处。于是，他们便常常借用社会发展的线性模式作为认识的框架，长于编年表，而对各影响因素之间的主次关系和隶属关系未得到满意的研究结论。但如果深究一座城市的历史演化过程的形态特点，我们发现它总是可由“型”(paradigm)“类”(type)和“期”(period)三个基本变量来概括地诠释。因此，笔者认为，建立一个理论上自律，应用上可行的，同时包含这三个变量的多级分类框架，就有可能深化我们对古代城市研究的认识。

所谓“型”，是一种较高层次的，隶属城市建设方法论和哲理范畴的变量。这里主要指古代城市发展和建设过程中的人的主导价值取向和文化隐喻。它既可来自人类生来俱有的生存本能需要及其与特定地域和文化环境交织的结果，也可以是人们对城市本质逐步形成科学认识的阶段性产物。

大致上，历史上城市的“型”有三类。

第一种，纯粹“自上而下”的“整体受控型”。这是一种由少数统治者、精英阶层或相对一致的社区群体意识和价值理想决定的“型”。例如我国古代、古印度、玛雅文化的一些君主都曾把自己的城市看作是宇宙的缩影，并据此建设起一些高度整体、统一的城市。实例有元大都、华盛顿、新德里、震后新唐山等。

第二种则是由若干个体的城市建设意向和活动叠合所构成的“自由放任型”。它常反映为随机、拓扑的物质形态，我国农业社会和欧洲中世纪的自由城市(free city)和商业城市都属这一“型”。

第三种，同样常见的是，历史上一些城市的发展演化交替受到了“整体受控”和“自由放任”两种设计价值取向的作用，有时，甚至在一个时期中两者同时存在。我国的历史城镇在经历近现代一系列建设活动时大体上都属这种“型”，我们把这种“型”定义为“控制——放任叠合型”。

“类”，即是指“按照事物的共同性质、特点而形成的类别”。(辞海，第1031页)这里的城市类别是以形态结构的显性特征或对评价城市有决定性作用的定量和定性结论为依据的。具体分析还可分内外两个层次，城市职能、规模、区域位置和用地结构类别属于后者，多属城市规划和地理学范畴；城市内部空间结构和形式的类析则属于前者，这常是城市设计和建筑学的对象。如硬质空间和柔性空间的分类(hard space 和 soft space)、图形与背景类析法(figure-ground analysis)和形态——类型学分析(morphotype analysis)。

“期”的概念简单地说，就是指一定的城市形态或建设活动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时段归属。它决定了时间维度，研究古代城市，特别是进行比较分析时，时间概念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关键变量，否则将失去准确性和可比性。

“期”的划分标准并没有普遍一致的公允

结论，经济学、政治学等都有自己的时段划分标准，研究时一定要抓住我国古代城市发展独有的规律和特征。大体上，我国城市发展有六个时段，第一时段，夏、商、周三代的城邑；第二时段从西周到北宋；第三时段从宋到清末；第四时段从鸦片战争到全国解放；第五时段从解放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1979)第六时段从三中全会始直到今天，现仍在延续。

至此，我们按照上述“型”“类”和“期”三个基本变量的类型学意义，就可对任何一个古代城市客体，找寻到它所归属的时空坐标。

在这个基础上，我们还可将不同地区、不同时代、不同“型”和“类”的城市放在一起进行纵横两方面的比较，进而考察它们之间的相互联系，或更深一层，探寻一种规划设计模式或传统的分布影响圈，流向轨迹，中心点及其传播和城市发展、变异的规律。然后，经逐级的分析研究，我们就可获得更为具体的认识，将上述结论进行梳理归纳，并用一定的术语来描述，便最终使研究成果获得了理论意义。

四、几点认识

经以上分析，笔者获得下列几点认识。

第一，对于古代城市研究，运用结构主义(Structuralism)理论和实证方法可使我们深受其益。建立深层结构—浅表结构的层次关系，大大地澄清了我们的思维逻辑，而这种思维又必须建立在坚实的案例研究基础上，否则只是沙基建楼。

第二，从学科建设角度看，我国古代的“自下而上”的城市(镇)研究分支亟待补阙，根据“型”、“类”和“期”的分析框架，我们很容易察见，中国古代城市的历史形态具有多样性，不能将“大一统”思想对城市的影响作用过分夸大，城市毕竟是一个多重复合的实体，其存在既有主观逻辑，但又有自然规律的作用。

探骊折札

——中国建筑传统及理论研究杂感

王 其 亨

一、从“瓜皮帽”谈起

“西装+瓜皮帽”的机智戏谑，自五十年代批判复古主义以来，至今流传，影响不小。它俏皮挖苦，却言之在理，一语道破了：现代建筑创作不能照搬传统形式，机械叠加或捏合于现代建筑。但如果象一些人，把这譬喻推崇到一个极端，认为现代化必定排斥传统，那就未免失之偏颇狭隘。大的道理不说，就事论事，引类譬喻，拈来几个人们常常熟视无睹的例子：

维吾尔小帽+西装；
鸭舌帽+蒙古长袍；
西式礼帽+藏式男袍；

第三，城市的本质是运动发展，所以不仅要着眼于研究单个城市的静止状态，如布局、道路结构、城市空间等，更要研究它的形态演化意义及其区域性外部联系。

第四，目前我国古代城市研究还远远未达到完美成熟，故应杜绝先入为主，浅尝辄止的研究“捷径”，提倡多元方法，其成果可互为参照、充实。在这个意义上讲，此文对我国古代城市研究问题的反思和类型学分析方法的构建本身就是这种多元视野中的一支，这也正是本文的撰写初衷。

西式烫发+绸缎旗袍+西式高跟鞋；

这些“现代化+传统”或“传统+现代化”的形式，不也未失合谐可人，楚楚显风彩吗？至少，不都是“西装+瓜皮帽”的不伦不类。

传统内涵丰富，绝非一条猪尾巴，一顶瓜皮帽，一座大屋顶可以涵盖。传统历来在发展变化，物竞天演，优胜劣败，用进废退。传统和现代化有抵牾，有冲突，也能亲合，在人们论说功罪是非中，不知不觉汇入现代洪流，任你“抽刀断水水更流”，“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这些明理，自勿庸赘述。

至于传统与现代建筑创作关系，如何发掘利用？如何结合？如何探索具有中国特色

参 考 文 献

- Morris, A.E.J., HISTORY OF URBAN FORM, 1979, 2nd edition, John Wiley & Sons, New York.
- Lynch, K. A THEORY OF GOOD CITY FORM, 1981, MIT Press
- 张光直：《中国青铜时代》三联书店，1983。
- 中国历史文化名城研究会编，《中国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与发展》，文物出版社，1987。
- 清《重修常昭合志》卷三，山水；卷四，坊巷城垣。
- 明嘉靖《江阴县志》
- 贺业钜，《考工记营国制度研究》建工出版社，1985。
- 梁从诫：从百科全书看中西文化比较，载《中外文化研究资料》第二集，1987。
- 张弘星：作为地图的山水画，《新美术》1988年第3期。

的现代建筑创作之路？等等，在当今社会多元化发展中，见仁见智，不必强求一律，也不在此细说。

笔者所感兴趣的是，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会有相当多的建筑师或评论家，赞成的也罢，反对的也罢，几乎众口一辞，把大屋顶当成了中国传统建筑形式的典型；于是会有“西装+瓜皮帽”的谑语长期流传。这不是心理定势问题，而是中国建筑传统与理论的研究，到底给实际创作带来了什么？留下了什么映象？产生了什么作用？“传统=大屋顶=瓜皮帽”，谁都会认为这种认识太机械、太浅薄、太寒碜。但看看近年来的“形似”、“神似”的议论，大多不啻谈玄。何谓形？何谓神？神在何处？何以体悟？也并没有把中国建筑传统与理论研究引向更深层次，以致说者谆谆，读者藐藐，致用实践，不济隔靴搔痒。

怨不得“瓜皮帽”式的奚落，也怨不得对于“神似”论说的藐藐，更怨不得很多建筑师未能看到维吾尔小帽、蒙古袍、旗袍之类。问题是，五十年来，尤其是开放改革以来，中国建筑传统与理论的研究，尚始终未能突破它最初奠定的架构，即突破对于中国古代各时期各类型建筑概况及表象特征的描述式研究方法。而这一方法取得的结果，虽在奠基者来说，是开拓性的，意义与贡献是极其伟大的，但以今天的现实要求，也以中国建筑传统的丰富内涵，以及史学发展层次来审视，无疑是很不够的。

中国建筑传统与理论研究在建筑界的窘困局面，在学术刊物上很尖锐地反映出来，一个无情的事实是，这许多年来，在《建筑学报》上，就看不到以传统方法研究而取得的新成果。在建筑教育中，也面临着深刻危机，笔者曾在二年前的《中国建筑历史教学方法与研究方法改革刍议》中指出。几乎每个从事教学的中国建筑传统与理论研究工作者，都有同样体会。如侯幼彬先生谈到，建筑学专业学生所需要新的知识结构，对中国建筑历史提出的一系列要求：

不满足于了解历史的建筑，而要求认识建筑的历史；

不满足于了解建筑遗产的表象、特征，而要求认识建筑文脉的内涵；

不满足于了解建筑遗产的多彩风貌，而要求认识传统建筑观念和符号机制；

不满足于了解一个个具体的建筑实例，而要求认识它们抽象的概括模式；

不满足于了解建筑遗产是什么样子，而要求认识它为什么形成这样的形态，要求认识制约它的社会结构、经济结构、环境结构、科学技术结构、文化心理结构等等背景及其制约机制；

不满足于微观地、孤立地评价中国建筑遗产，而要求把中国建筑体系放到中国社会大系统中，放在世界建筑历史的广阔背景上，进行宏观的比较的考察；

不满足于从中国建筑历史的学习中，仅仅获得建筑历史的知识和素养，而要求获得认识论和方法论的收益，建立鉴往知来的历史意识和历史眼光。

这些新的更高要求，实际是在教学中所反映出的社会现实要求，即当代我国建筑创作实践的要求，不也正是史学工作承前启后，革故鼎新的现实任务吗？

二、《斯干》小议

以现代方法研究中国建筑传统和理论，古为今用，自然是无可厚非、站在古人立场，以古人眼光审视他们的建筑，至少对于史学，应属必要。实际上，古人眼中“如跂斯翼，如矢斯棘，如鸟斯革，如翼斯飞”建筑艺术事象，就为今人观照古建筑的审美体悟，注入了丰富情趣。而且，和“瓜皮帽”的奚落相对立，成为描绘中国古典建筑优雅形象的典故式语汇，脍炙人口，至今不衰。古人智慧不低，由此可见一斑。

但很有趣的是，如果读读这些诗句出处，即《斯干》的全文，至少是相关的几段，全

可以发现；古人眼中的建筑，在跂翼、矢棘、鸟革、翼飞之外，竟还有更多更重要的讲究和追求，长期被忽视了。为澄明之，容不观烦缕，摘陈几阙，缀以今译：

(一)

秩秩斯干，幽幽南山。如竹苞矣！如松茂矣！兄及弟矣；式相好矣，无相犹矣。

(二)

似续妣祖，筑室百堵，西南其户。其居屋处，爰笑爰语。

(三)

约之阁阁，椓之橐橐。风雨攸除，鸟鼠攸去，君子攸芋。

(四)

如跂斯翼，如矢斯棘。如鸟斯革，如翬斯飞。君子攸跻。

(五)

殖殖其庭，有觉其楹。哈哈其正。哕哕其冥。君子攸宁。

.....

这是在二千八百年前，人们赞美周宣王姬靖的新宫。对建筑的整体构成，已至少有这样一些评价认识和追求：

(一)人与自然的合谐与合同，良好生态环境与优美自然景观。

(二)座向良好，有和谐伦理秩序的建筑组群布局。

(三)坚固安全的建筑结构，完善的防卫功能。

(四)优美的建筑艺术形象。

(五)建筑艺术作为审美对象，应有教化陶冶心性情操的精神功能。

今天，经历了“三P危机”以后，学术思潮发生重大转折，人们开始重新评价人与自然的关系，注重同自然和谐而不是对立，

建筑设计思想由注重单体艺术处理，注重形式美，趋向于注重群体及至整体环境的艺术处理，包括生态与自然景观，注重建筑作为文化传播媒介的精神功能，包括符号、文脉等等。

对照古今，一中一西，竟乃通同，令人惊讶，更令人深思。事实上，由此审视比较，足可发现，五十多年来，研究中国古典建筑，一向只注重其艺术表象形式，以至于津津乐道其跂翼、矢棘、鸟革、翠飞之类，却忽略了其它丰富内涵，实在是相当片面的。在这一学科奠基和架构之初，是情有可原的，但在今天，着力检讨认识方法，研究内容的不足，迅速填补空白、缺环，显然是当务之急了。

三、“鲁作楚宫”的联想

鲁作楚宫，见载《春秋》与《左传》。说春秋时，鲁襄公适楚，慕其宫室华美壮丽，及归，乃于鲁国仿造楚宫。最初读史及此，颇觉诧异：一是鲁有梓庆、公输般一流工匠，超群绝伦，蜚声古今；鲁国文化，也一向是周文化“郁郁乎文哉”的正宗传承，孕育了孔子这样的大文化人；故鲁王宫室制度，想见一定不凡。二是，一部中国古代建筑史，大一统的文明，也一向以中原及北方为正宗；灿烂辉煌。鲁国自然不会例外。而鲁襄公到了荆楚夷地，居然为宫室倾倒，是新鲜好奇？还真是华美超绝中原？

此后留心，结果发现，问题不是鲁襄公之好奇非分，而恰恰是，在中国古代大一统的文化中，始终存在着多元性地域文化的发展，而且，和传统史学观相在，先进的文化，并不只是在中原，在很长时期里，甚至是长江流域的楚文化、吴越文化，超绝中原，也影响了中原，推进了中原文化发展。整个古代文化，正是由这多元文化，包括吴楚以及其他地域文化，在长期交流融汇中，发展成熟起来。

例如，河姆渡遗址证明，新石器时代，长江下游一带木结构建筑技术水平高于黄河

流域。

春秋时期，鲁作楚宫也殊非孤例，说明当时长江流域建筑高于黄河流域。文献与考古材料表明，高台建筑在春秋时最先发端于吴楚，向北传播，形成战国时的风靡中原，墓葬起坟丘，也是如此。与鲁作楚宫同期，楚灵王建章华台行宫，当时堪称举世无双，而最近在湖北潜江发掘出遗址，规模壮丽，引人瞩目，证明史载不虚。目前发掘工作尚在进行，其宫墙用红砖砌筑，在我国建筑史上属于已知最早之例。前此尚有湖北随县曾侯乙墓的发掘，早使学术界对楚文化刮目相看，不得不承认其水准远出中原。

战国期间的大量出土文物中，木榫卯是当时木构建筑技术的典型表征，而细心分析，则可发现，最精巧复杂的，其分布应用，仍不出当时楚文化圈及其影响范围。

已有学者阐明，秦汉文明受益于楚文化不少。如老庄哲学。由楚辞到汉赋、神仙方术等等。建筑亦莫能例外，正是大一统中国前后的交流溶汇，才促进了中国木构建筑趋于成熟，衍为体系。

东晋时，北方战乱，大批人士及百姓南迁，形成北南文化的一次大规模直接交流。在北方，以孔子儒学及诗经可为典型代表，文化情趣重在现实理性，讲究伦理道德和修齐平治。而南方，老庄哲学和楚骚不失为典型观照，文化性质更富超凡出俗的浪漫主义色彩。及晋人南迁，两大文化相交汇，形势为之一变，在这山青水秀的环境中，玄学、寄情山水诗、山水画以及山水园林，便脱颖而出，使整个中国文化，包括建筑文化，发生了新的重大转折。直至南朝结束，一直保持着高出中原及北方的先进水准。以致北魏文帝仰慕汉文明，迁都洛阳，派蒋少游不啻为间谍，出使南齐建康，侦探其城市宫室制度，仿效而规划建造了洛阳城及其宫室，就是典型例子。

甚至在隋代统一中国之初，营建都城宫室，也是着意留心研究和效法其前南朝建筑，

如主持规划设计大兴城、洛阳城及宫室建筑的将作大匠宇文恺，就详细研究过南朝、宋、梁、陈等有关建筑档案载籍，并赴实地作现场考察极尽详慎。在北魏晚期，源于南方而随北魏孝文帝仿效南朝制度在中原出现的歇山式样，被称之为汉殿，即代表着南朝汉文化，也在隋代风靡中原，大化流行。

由此可见，隋朝以后唐代有容乃大的辉煌文明，其中包括建筑文明，诸如木构建筑体系的成熟，山水园林的风行，歇山式样的时兴，等等。南方的先进文化、先进的建筑技术和艺术，是起到很大作用的。

至五代，北方割据政权攻战频繁，惟南方吴越、南唐、前蜀承平，文化较唐发展，建筑艺术亦然，仍然形成高于中原文化及北方的水准，在宋代再度起到主导作用。如浙东哲匠喻浩，在北宋初入主京师主持重大建筑工程，其著木构建筑术书《木经》，也成为宋《营造法式》这一划时代建筑要籍的先声。

在明清两代，营造北京城及宫室，皇家园林，有大量南匠供役，制度式样仿效于南方，如南京城、江南私家园林等等，也是人们熟知的事实，不必赘述。

上述诸多事象，偏固资料挂漏，难免失之管窥蠡测。但长期以来，治史之道往往偏持于大一统，忽视了多元性，忽视了地域文化对于大一统文化的影响和贡献，也是事实。正因如此，才造成牧摄地域文化多元性的各方面资料贫蹙，难于详慎深入分析阐发其意义价值。

近年来，有各地方民居的深入发掘研究，并系统编辑出版，这对于认识地域建筑文化，无疑为一大幸事。但笔者认为，这还远远不够突破大一统中国古代建筑历史的旧格局。如果有一部部多彩多姿，各显声世的地方建筑史，那才是建筑史界的莫大幸事。中国建筑历史的深入发展，赖此雄大基础，能得新的突破，达到新的境界，将是不言而喻的。中国古代建筑文明有容乃大的发展历史，本身就证明了这一点。

四、为风水正名

五十余年来，研究中国古代建筑史，风水理论一直为禁地，忌讳莫深。虽然，很多学者都知道，数千年间，中国古代城镇、官宅、寺观、园囿、陵墓、道路、桥梁、及至打井修河等等，几乎一切建筑活动，都深受风水理论影响，而且常常是决定性的影响。但是，除五十年代考古界研究宋代墓葬，涉及风水研究，如五音姓利说，等等外，建筑史界却并无发掘研究。

情况至此，原因诸多。“五四”以来，中国学术研究大多借助西学方法，与当时西方科学技术抵牾的传统学术，往往嗤之为封建迷信。即如中医，因其阴阳五行、脏象温病、气脉经络诸说与西医迥异，也被崇尚西学者斥为巫医，从北洋政府到国民党政府，竟一再明令取缔中医。风水理论，尤其盛行于世俗间者，颇为讲究五行生克、吉凶祸福，其迷信色彩尤重，当然更登不得学术研究的大雅之堂了。

事实上，当笔者涉入清代陵寝研究时，也未尝没有这种先入之见，即风水多属迷信。但因陵寝选址规划受风水决定性影响，虽师承无人，内容玄涩，也只能硬着头皮钻了进去，结果，令人大吃一惊的是，阅检了大量原始档案图籍，却并没有什么荒诞不经的迷信，而无非追求“总以地臻全美为重，不在宫殿壮丽以侈观瞻”；细心选择形胜之地，使陵寝建筑“遵照典礼之规制，配合山川之胜势”，以取得人文景观与自然景观的完美结合，即“陵制与山水相称”，形成庄严、肃穆而又生气自然、永恒、崇宏的纪念气氛。

借着能与实际地形地貌及建筑遗存相对照的档案与图籍，初步弄清了有关术语的意义，进一步研究风水术书，结果，又很惊奇地发现风水流派诸多，如理气宗与形势宗；而其中如形势宗，并无五行生克、吉凶祸福的拘忌，正是清代陵寝所应用者。

丁芮朴《风水祛惑》说“风水之术，大抵不出形势、方位两家，言形势者，今谓之峦体；言方位者，今谓之理气。唐宋时人，各有宗派授受，自立门户，不相通同。”

王祎《青岩丛录》谓：“后世言地理之术者分为二宗。一曰宗庙之法，始于闽中，其源甚远，至宋王仍大行。其为说，主于星卦，阳山阴向，阴山阴向，不相乘错，纯取五星（行）八卦，以定生克之理。其学浙闽传之。而今用之者甚鲜。一曰江西之法，肇于赣人杨筠松、曾文遄；及赖大有、谢之逸等，尤精其学。其为说，主于形势；原其所起，即其所止，以定位向，专注龙、穴、砂、水之相配。其它拘忌，在所不论。其学盛行于今，大江南北，无不遵之。”

所谓龙、穴、砂、水及相衍生诸多术语，实不过“以人之意逆山水之意，以人之情逆山水之情”，因“山水之情性不一，龙穴之位置各陈，因形立名，顾名思义，不在标奇，贵乎近理”，能“相江山而择吉，晓人有法”。如龙之谓，乃“指山为龙兮，象形势之腾伏”；而穴之谓，乃“地以葬口为穴者，犹人身针灸之穴也”；等等。至于风水本意，概言之，不过讲究“所谓风者，取山势之藏纳，土色之坚厚，不冲冒四面之风与无所谓地风者也；所谓水者，取其地势之高燥，无使水近夫亲肤”。

消弥了先入之见，了解了风水概略，对这理论的研究自然容易深入。其结果，发现风水理论实际上是一门综合性、系统性很强、也富涵美学成份的古代建筑选址规划设计理论，包含了地理学、地质学、生态学、景观学、建筑学、心理学、伦理学，以及美学等诸多丰富内容。而且，几十年来研究中国古代建筑，形成的许多有关古代建筑思想、理论和方法的空白，也恰恰能在风水理论中找到答案。

例如，中国古代陵寝有筑陵以象山。因山为陵、或依山为陵的传统，概称山陵。但为何有此追求？为何称为山陵？为何建筑往